

今年，我刊「二十一世紀評論」專欄組織了多期反思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文章，力圖就這一熱門的話題，提供多元的視角，從而有別於內地帶有官方色彩的紀念以及民間就事論事的批評。儘管視角多元，但是這些文章往往都從「國家」的變化來切入主題。毫無疑問，和中國的經濟發展奇跡相類似，中國的國家轉型依然是一個社會科學中的未解之謎。我刊將繼續有關論題的討論，歡迎各方讀者以各種方式參與這一討論，共解謎團。

——編者

「社會民主主義」抑或「民主社會主義」？

《二十一世紀》2008年8月號刊發的旅美學者曹天予的長文〈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簡評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轉型〉，對於自去年以來在中共黨內外興起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作了一番深入的探究，尤其是對於其興起的各種因素及其可能的後果作了詳盡的分析，這對關切中國政治走向的讀者不無啟發。

但是對於作者在文中所構建的以「民主社會主義」替換「社會民主主義」，來作為此後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筆者尚存疑慮。相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務實傾向與社會工程技術取向，「民主社會主義」許諾了一個沒有剝削、特權與壓迫、實現高度人民民主的願景，並且反覆申述工農大眾的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歷史主體地位。從某種意義上，後者似乎可以將當下的訴求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特性結合起來。

但若仔細分析，我們就會發覺這種訴諸階級解放和人類整體解放的理想，若沒有「社會民主主義」作為根基（作者認為在今日的中國實行「社會民主主義」很可能導向新自由主義，而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語境似乎已經是過街老鼠），沒有作者所質疑的人類普世價值（如個人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的支撐，很可能就淪為烏托邦式的空談。

與其為了延續政治意識形態的歷史遺產，而將社會主義與民主橫向接榫，不如先用「社會民主主義」這個比較偏向中性的概念，來撬動中國政治意識形態內核，將具有普世價值的理念扎根進中共的政治與公共生活（連這個都是任重而道遠呢）。對於自由與平等尚且匱乏的當下中國來說，我們寧可選擇「社會民主主義」這塊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麵包「聊以果腹」，也不想用「民主社會主義」這塊換湯不換藥的社會主義蛋糕來「畫餅充飢」。

唐小兵 上海

2008.9.1

地震預警，質疑多於共識

由一個非科班的地震預警專家來討論地震預警問題，多少帶有些反諷意味。錢鋼〈在地震預警問題的背後〉（《二十一世紀》2008年8月號）一文關注地震預警問題背後的深層次問題，確實值得我們反思。

汶川大地震發生以來，針對地震預警問題的反思與質疑的聲音一直沒有中斷。為甚麼我們的地震預警科學研究竟然與普通人的常識相差甚巨？為甚麼地震發生以後，我們的官方與地震局的要員除了忙於為自己辯護之外，就沒有面向大眾與災區人民作任何反思與檢討呢？難道一切只以地震預測是世界難題為藉口？面對肆虐地震，我們就真的束手無策了嗎？

為甚麼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我們在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較經濟、科學技術極其落後的文革時期相比，我們的地震預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退步了呢？地震預警，是寧可信其有，還是寧可信其無？中國在文革時期採用「土方法」、經驗預測的方法成功預測大地震，雖然尚未獲得世界

地震預測科學的科學性公認，但也給予了地震預測經驗性方面的充分肯定。當我們一切以科學為標尺的時候，應當如何平衡經驗研究與科學研究在地震預測中的作用？為甚麼我們有那麼多的地震成功預警先例，還會發生類似汶川大地震的巨大災難？7.8級的汶川大地震，真的就沒有甚麼前兆嗎？

當我們陶醉於科學技術的驚人之舉、陶醉於經濟發展的輝煌業績、陶醉於中國巨龍的勃然崛起之時，上至最高主政者，下至普通百姓，我們對地震的警惕有幾何？我們對地震預警的重視、投入有幾何？我們關於地震的相關知識的推廣與普及又有幾何？

阮思余 廣州

2008.9.3

究竟如何與國際接軌？

多年來，「與國際接軌」已成為一個時髦的口號。任何一種經濟行為一旦套上這一帽子就似乎具有了不證自明的合法性。讀了顧昕的〈市場經濟的多樣性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二十一世紀》2008年8月號），很受啟發。顧文從一個基本問題切入：究竟甚麼是國際軌道？有沒有一個單一的國際軌道？其實這個問題本身一點也不複雜，但卻具有顛覆性。因為如果根本就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可稱之為「國際軌道」或「國際軌道」有多條而非一條的話，那麼「與國際接軌」所指何謂呢？實際上，市場經濟的多樣性在西方已是基本常識，「與國際接軌」絕非意味着與美國模式接軌。

因此，「與國際接軌」必須注意：首先，要明確究竟要接甚麼「軌」。否則，這個「軌」接一下，那個「軌」接一下，結果是眉毛鬍子一把抓，最後合成了一個「四不像」。其次，要明白任何一條「軌」必然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往往要有相應的修補機制來彌補其短處。比如說自由主義勞動力市場制度，長處在於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有利於提高效率，短處在於容易形成兩極分化，這就需要相應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修補機制。我們在與某一制度「接軌」的時候應全面了解、揚長避短，不然便很有可能正好把人家的缺點「接」過來，我們民營經濟部門中曾經實行的「比美國模式還美國模式」的勞動力市場制度即是如此。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要樹立「以我為主」的意識，要對自己實際情況有充分的了解，只有這樣才能準確找到需要接的「軌」，並清楚究竟應該「接」哪些「軌」。

黃家亮 北京

2008.9.4

社會改良主義者的幻想

蕭延中在〈中國費邊主義的思想遺產〉（《二十一世紀》2008年8月號）一文中，用唯美的史論筆法闡釋了費邊主義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文中論述中國知識階層在「如何改造中國」的問題上，採取了一種「緩進式的、非暴力的合法漸進的理性路徑」。

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從歐美留學歸來的自由主義者加入以胡適為核心的知識

份子議政組織——平社，標誌着一個中國式的「費邊議政」的開始。平社是羅隆基仿效其倫敦大學的恩師拉斯基 (Harold J. Laski) 所從事的政治舞台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而發起的，並得到胡適、梁實秋等人的鼎力支持。作為一個以知識精英為主導的政治社團，平社在當時幾乎輻射和掌控了各大學科的「話語霸權」，然而，平社的活動方式和議政參政的特點極其富有書齋色彩和漸進色彩，因此，胡適、羅隆基、王造時、梁實秋、徐志摩、潘光旦等人在商議「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時，總是無法淡化掉「書生議政」所帶來的這份濃厚的書齋色調。

如果說精英特質和書齋色調是平社的主要外在形式，那麼，政治主張的溫和漸進改良色彩則必然是其具體內容。儘管費邊社公開聲稱其信仰的是「自覺的漸進主義」，並堅信「循序漸進」才是社會的常態和社會進化的正軌，遺憾的是，平社仍沿着費邊社的改良主義路線圖，重蹈覆轍。胡適希望通過改良主義路線將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等弊病逐個清除，這與費邊社的「自覺的漸進主義」何其相似！只可惜，中國「費邊式」的「書生議政」實踐的最終宣告失敗，印證了自由主義大師波普爾 (Karl R. Popper) 的註解：「一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在一塊無傳統的白板上合理地設計的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

倪明勝 天津

2008.9.9